

红色地标:梨园口战役纪念馆

临汾县曾是红西路军征战河西的主战场和总指挥部所在地,是红西路军征战河西停留时间最长、战斗规模最大、伤亡人数和战斗遗址最多的地方。为缅怀英烈、慰藉忠魂、激励在世、启迪后代而建设的梨园口战役纪念馆,目前已成为集瞻仰纪念、爱国教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基地。

位于张掖市临汾县的梨园口战役纪念馆始建于1986年,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馆内现珍藏红西路军珍贵文物、书画作品、武器实物等190多件,图片资料800多份,文字资料30万多字,主要陈列着红西路军在临汾境内转战的历程,再现了红西路军广大将士英勇杀敌的历史场景。

走进纪念馆,一件件鲜见的实物展品、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记录着红西路军血战河西、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悲壮历程,也将那段“不能忘却的红色记忆”重现眼前:1936年12月28日,红西路军从永昌出发,向西推进。30日,红西路军先头部队红5军首先抵达临汾县城(今蓼泉镇),由军政委黄超率领37团、43团留守临汾,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红39团、45团继续西进,于1937年元旦攻克高台。红30军、9军和红西路军总指挥部沿祁连山北麓向西跟进。

红军进驻临汾、高台后,积极宣传和红军的主张,开展扩红建政活动,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汾县、高台县政府,

号召军民一致抗日。1937年1月3日,红30军及总指挥部进驻祁连山北麓倪家营。

1月12日,敌人切断了高台和临汾之间的联系,牵制住沙河堡和倪家营的红军主力,并动用飞机、大炮攻击高台红军。20日中午高台城陷落,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2000多名将士壮烈牺牲。期间,总部得知高台危机的消息后,曾于19日派出唯一的骑兵师前往高台增援,行至明水河时遭敌伏击,损失极大,驰援行动宣告失败。随后,敌人又集中兵力开始疯狂围攻临汾。在西路军总部四局科长秦基伟的指挥下,守城所有部队,包括一个警卫连、妇女独立团、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全部上阵,与敌苦战3昼夜,后在红9军的接应下,大部突围,辗转与红30军汇合。红9军也随即撤离了沙河堡向总部倪家营靠拢,红5军其余各部全部被编入红30军。

高台失陷后,红西路军总指挥部决定率军东返。部队集结西洞堡后,曾围歼敌突兵团1200多人,缴获一批枪支器械、马匹等物资。但由于敌人在东进沿途集兵反堵,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再次重返倪家营。重返倪家营的红军在龙王庙前召开了公审大会,当场处决了伙同匪团血洗倪家营,残忍杀害红军伤病员的当地大财主李成英、李成基等人之后就地休整,各部分别驻进了廖家庄、李家庄、曹家庄,供给部还在罗家庄

建起了兵工厂。但紧跟而来的国民党马步芳部调集骑兵旅和民团数万人将倪家营团团包围,展开进攻。缺衣少食,弹药不足的红西路军将士与敌展开殊死搏斗,鏖战40多天,毙敌近万人,但红西路军自身伤亡也很大。

3月1日,红西路军为摆脱困境向西突围转移到了三道柳沟。尾随之敌也迅即到来,战至11日,红西路军伤亡比较严重,总指挥部决定再次突围,从倪家营村附近的梨园口向祁连山转移。12日,部队向东南疾进到达梨园口,红9军和妇女独立团2营担任掩护总部和大部分向祁连山内转移的任务。战斗中,红9军政委陈海松、红25师政委杨朝礼、红9军政治部敌工部长黄思彦、73团团长沙汉言等先后壮烈牺牲。妇女独立团在战斗中亦伤亡惨重。梨园口一战以后,红西路军被迫撤向祁连山深处,红西路军被迫撤向祁连山深处的康隆寺(今属肃南县),全军仅剩3000余人,至此,经过2个多月的苦战,红西路军离开临汾。

为更加直观形象展示红西路军在临汾的征战历史,纪念馆先后建成了浮雕大门、烈士纪念碑、烈士公墓、10座军级烈士纪念馆、20座师级烈士纪念馆、革命历史博物馆、纪念馆陈列室、徐向前、李先念两位军事领导人铜像、红西路军总指挥部纪念馆、模拟型战斗遗址——汪家墩碉堡和题词碑林等纪念建筑,在进一步提升纪念馆功能作用的同时,也为开展爱国主义和红色革命传

统教育、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生动课堂。近年来,该馆始终以秉承革命遗志、弘扬爱国精神为宗旨,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弘扬和培育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爱国精神、红西路军精神,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国防教育等各类教育活动。结合各类纪念日和重大活动,组织广大干部群众、中小学生学习重走革命遗迹、重温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敬献花圈花篮等革命传统教育活动。组织开展爱国情感教育,广泛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每年以“清明”“七一”“八一”“国防教育日”以及“烈士公祭日”等传统节日为依托,免费为中小学生和驻临及县外部队官兵开放参瞻,接待当地干部职工、农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参瞻凭吊,组织他们参瞻革命历史博物馆、纪念馆陈列室的图片、实物史料,安排讲解员为他们细致讲解西路军征战河西的悲壮历程和重大意义;结合相关纪念日举办“学雷锋”“祭先烈”“党在我心中”等活动,突出未成年爱国主义情感教育。通过精心策划活动载体,热情讴歌西路军艰苦卓绝的奋斗史,波澜壮阔的战斗史,可歌可泣的光荣史,着力弘扬西路军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引导青少年和广大干部群众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良好精神状态,为建设幸福美好新张掖提供精神动力。

(来源:张掖日报)



谢缙泰设计的“中国”号飞艇

谢缙泰,字圣安,一字重安,号康如,祖籍广东省开平县塘口潭边园(今潭溪乡),1872年5月16日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

父亲谢日昌,1866年离开家乡到海外谋生,后来在悉尼开了一家“泰益”号商行,经营进出口商品。母亲郭氏是第一个到达澳大利亚的中国妇女。

1887年5月,16岁的谢缙泰随母亲以及姊妹5人,乘海轮离开悉尼回到香港。在香港,他进皇仁书院读书,由于英文根基深厚,学习成绩甚佳,因而颇受师长赏识。皇仁书院毕业后,谢缙泰先在港府华民政务司做事,继而在职工事务局供职。工作之余,他常结交有志之士,议论国计民生,并潜心研究科学技术,有过不少的发明创造。

至于对飞艇的研究,早在1894年的时候,谢缙泰就已经成竹在胸了。本来,他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国家,以造福社会。之所以迟迟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清朝政府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正如当时的《中国邮报》所说的那样“始之无教育,继之无辅助,终之无保护”。再好的工艺落在那些官僚的手中,大多一笑置之,有的发明者甚至还被讥为癫狂。有鉴于此,1899年,谢缙泰积多年的研究心得,绘制了一张飞艇的详细图样,并附上一张结构说明书,邮寄给当时英国著名的发明家墨克西先生。

谢氏飞艇上面用英文写着CHINA的字样,这艘称之为“中国”号的飞艇,从整体来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是巨型雪茄形气球,下部是铝制艇体,气球主要起浮升作用,艇体则具有升降、前进和后退的功能。战争时期,气球还可以用铝壳包裹,避免被炮弹击破。艇体的推进器是3个用马达发动的螺旋桨,它们分别安装在艇首、艇尾和艇面上,因而推行的力量很大。至于艇翼升降和转弯,不用舵和舵桨一类,而是采用钢翅。钢翅藏在艇内,启动开关之后,即可外张至艇的两侧。据说,时速可以达到97~150千米。显然,这种铝壳雪茄形,装有推行装置并有两翅的快速飞艇,已经与近代的飞机很接近了。难怪墨克西先生接到谢缙泰寄去的图样及说明书之后,很快复函,对他大胆的构思和合理的设计深表敬佩。当时世界上不少画刊都曾刊登过这个设计方案。当然,今天有的专家经过科学的论证,说谢缙泰的设计不符合当时的材料和技术要求,只是一个不合实际的设想而已。

谢缙泰不仅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飞艇设计师,而且也是一位忧国忧民、不断追求光明的革命志士。

“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这是谢缙泰在1898年写的一首诗。谢缙泰还在香港英文报《南华晨报》长期从事报业,他宣扬革命,并著书20余种,其中有《日俄战纪》和《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等。

1937年4月1日,谢缙泰病逝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的住宅里,终年66岁。谢缙泰生前曾对人说,希望将来把自己设计的飞艇制造出来,然而这位爱国的发明家最终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来源:航空工业出版社)

谢缙泰:中国飞艇设计第一人

响水革命斗争史大事记(十三)

1956年2月21日 县人委发出关于区划调整的通知:响水、黄圩两区合并为响水区,钱长余任区委书记,汪学仪任区长,辖13个乡1个镇,区政府驻响水镇;六套、双港两区合并为六套区,梁鑫任区委书记,南修德任区长,辖16个乡,区政府驻六套镇。调整后全县辖8个区、90个乡和9个镇。

4月6日 县人委根据省编委通知精神,决定将原8个区99个乡镇,

再度调整合并为7个区33个乡镇。其中六套区由原16个乡合并为5个乡;响水区由原13个乡4个镇合并为4个乡1个镇。

4月26~30日 中共滨海县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东坎镇召开。与会代表450人,列席代表37人。选举县委常委29人,候补委员7人,县监察委员会委员13人和出席省第一次党代会代表7人。李子建当选县委书记,周鹏程、许景荣、刘金林、高储书、鲁安贞当选县委副书记。

8月1~3日 强台风过境,风力达11级,刮倒房屋2070间,刮坏8909间,砸伤17人,农田受淹20多万亩。县人委发放救灾款94.8万元,派出大批干部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国务院拨款200万元救灾。

10月18日 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滨海县委员会。25日,撤销滨海县各界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冬 全县组织5万多名民工投入36万亩旱改水工程,至12月底完工,开挖75条干支渠,挖土556万方。

12月30日 全县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575个,入社农户10.25万户,占总农户92%,基本实现高级社化;初级社133个,入社农户0.86万户,占总农户5.1%,合计入社农户11.12万户,占总农户97.1%。

1957年1月7日 国务院内务部救济司司长熊天荆一行5人,深入滨海县响水区的黄东、高庄和八巨区的陆集等地对灾民和烈军属进行慰问。

5月11日 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讨论夏季生产、整顿农业合作社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

8月15日 全县进行开区并乡,将原8个区并为6个区,成立6个区委,作为县委派出机构,撤销99个(镇)党总支委员会,成立36个乡、镇党委。其中响水区辖响水、黄圩、周集、小尖、正茂5个乡;六套区辖亭泉、环覃、王集、八烈、六套5个乡。

11月10日 县级机关整风运动开始,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反“右派”斗争。1958年11月10日结束,有36人确定为“右派”。

11月 开放自由市场。全县建立证照管理制度和统一度量衡制度。(党史办 王志迁 高云 滕仕惠)

未来四天台风“烟花”继续影响我县

一、6号台风“烟花”最新动态

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今天(26日)上午9点钟在杭州湾西部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于上午9点50分前后在浙江省平湖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28米/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78百帕。“烟花”将以每小时5-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下午可能进入江苏境内,28日凌晨在苏皖交界处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

二、风雨实况

受“烟花”影响,25日05时到26日11时,我县出现小雨,阵风7级。

三、天气预测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台风“烟花”可能在我省周边和境内停留4天左右,对我县仍有较明显风雨影响,持续时间长。预计26-29日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累计雨量40-60毫米、局部80-120毫米;全县东到东北风内陆7-8级阵风9-10级、沿海海面8-9级阵风10-12级。

具体预报如下:

26日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东北风7-8级阵风9-10级,气温26-29度。海区:东北风8-9级阵风10-12级。

27日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7-8级阵风9-10级,气温26-29度。海区:偏东风8-9级阵风10-12级。

28日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7-8级阵风9级,气温26-29度。海区:偏东风8-9级阵风10-11级。

台风“烟花”登陆后的环流维持时间很长,30日我县仍可能受其残余环流影响,由于后期路径依旧有不确定性,需持续密切关注。

四、建议

有关部门继续做好防台措施:

- 1.防御强风和暴雨给农业、交通、海洋渔业和疫情防控、建筑工程、电力设施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 2.提醒公众减少外出,停止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
- 3.加固门窗、围板、棚架、广告牌、玻璃幕墙、塔吊以及设施农业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

台风“烟花”登陆后的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我局将密切监测其动向,及时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

响水县气象台
2021年7月26日12时

古人如何防汛



记录。从水则碑我们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

古代的防洪法规:“涨水月”沿河官员轮流值班

我国古代各朝还制订过许多防洪法规,从制度上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其中,金朝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

《河防令》的主要内容:

第一,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初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不得有误。

第二,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

第三,规定河防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

每年的汛期,各地总有一些区域受到强降雨袭击,造成洪水灾害。其实,在人类生活进程中,洪泛灾害从来就是人类最面临的大自然之凶敌。那么,我们的先人是如何防治洪水的呢?

古代也有水文站

据史料分析,我国古代从大禹时起就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而随着社会发展,历代各朝更是注重在各河流域处建站监测水文。

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的“白鹤梁”,就是我国古水文站的一处罕世遗迹。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故古人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

白鹤梁石鱼题刻保存最好,价值也很高。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连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

白鹤梁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最早期的“水文站”,见证着我国古代水文治理的历史成就。

在宋代,吴江(今江苏省苏州)上立有两座水则碑,建于1120年。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

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的原始

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当时朝廷还规定,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对此,人们家喻户晓,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者,大都会自觉避让。

古代,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羊报”。

所谓“羊报”,就是报汛水卒。据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如水位超刻痕一寸,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超码水涨一丈。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讯),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

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羊舟”也很独特,它用大羊剖腹剝去内脏,晒干缝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颇似筏筏。“羊报”执行的是一种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古代的“羊报”被抢救上岸后,有的在河中扑腾多天,早已饿死、撞死或溺死,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

元代时,朝廷还根据自然条件,设有陆站、水站、轿站、步站等报警驿站。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故设有狗站。训练狗作为通信报警工具,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当时,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水警。

以上文字据《自然之友》、《济南时报》等